

徜徉海派文化

ZHUANXING YU FANSI CHANGYANG HAIPAI WENHUA

转型与反思

管志华 著



本书是作者阐述海派人文精神的纪实随笔，对海派的历史文化、城市演变、生活习俗及精神迁徙进行独到观察，分析上海及周边文化领域或凸显或隐蔽的生活形态，对社会转型时期相互交织、陆续浮现的各种文化、理念、思潮作了剖析，讴歌坚守理想信念、激发爱国情怀、担当诚信道义、传递正能量的社会人物。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上海大学出版社

■■■■■

卷之三

通志卷之三

一、本志所載之人物，係指在本縣境內出生或在本縣境內活動之人士而言。其在本縣境內出生，而在本縣境外活動者，亦在本志範圍之內。其在本縣境外出生，而在本縣境內活動者，亦在本志範圍之內。其在本縣境外出生，而在本縣境外活動者，不在本志範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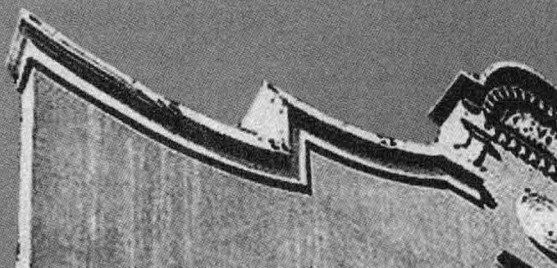
1

转——型——与——反——思

徜徉海派文化

管志华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与反思:徜徉海派文化 / 管志华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5

(转型期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ISBN 978-7-5671-1241-4

I. ①转… II. ①管… III. ①海派文化-研究-上海市 IV. ①G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4645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龚维才

封面设计 倪天辰

技术编辑 章 斐

封面书名题字 程振旅

转型与反思

徜徉海派文化

管志华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休宁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8.5 字数246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241-4/G·1587 定价: 65.00 元

弱势者^①的空间——以上海为例

王晓明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组词：“民主”、“平等”、“共同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弱势者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和好坏，可能是衡量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的标准。

讨论城市中的弱势者的空间，上海并非一个让人愉快的例子。最近20年，上海的城市空间变化巨大，游客蜂拥而来，不少本地居民很自豪，兴奋的外国人也不少，我过去居住的那座公寓楼，现在三分之一住着外国人，其中许多是欧洲人。但是，这些变化的另外一面，却是本地“弱势者的空间”的不断变小和变坏。

举三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其一，大批低收入阶层的市民迁往郊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重新建立房地产市场，20年来，这个市场以令人震撼的速度大规模扩张，其后果之一，就是市中心的数百万居民迁往郊区，其中大部分属于低下收入的阶层。这是一种一半主动、一半被动的交换：为了住进一套大一点的公寓，他们放弃享受城市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商业和公共服务，每天花比过去多一倍

^① 区分“弱者”和“弱势者”是十分重要的，后者并不一定真在能力上是弱的，只不过被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等级秩序处理成了“弱者”。

的交通时间去上班——如果有班可上的话。

今天，往往是商业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决定一个地区的物价和治安状况。上海再次^①形成了这样的空间结构：从内向外、一圈一圈、越是外围、生活条件就越差。市中心的居民，越来越多是比较富裕的中上阶层人士，在干净、漂亮、两边站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企鹅一般摇摇摆摆地散步。城市边缘区域的居民，则急匆匆地从—一个地铁站走入地下，半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以后，又从另一个地铁站冒出来，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和老鼠差不多。

对企鹅们来说，上海是一个与其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外国租界差不多大小、基本可以步行的城市，从最好的餐馆到最好的电影院，10分钟就走到了。但对老鼠们来说，上海是一个巨型城市，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远得令人绝望。

这样的情况绝非只发生在上海，也不只是中国才有。至少第三世界的大多数较大的城市，都有类似的情况：一座城市里，实际上并存着好几座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城市，企鹅们与老鼠——或其他局促紧张的生物——们的隔离，日益全面。

其二，“非轿车族”的地上通行权缩小了。20多年来，上海新辟了大批地面道路，更有好几条高架快速道，水泥巨蛇一般蜿蜒在高楼森林里。但是，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司机开车接送，也没有足够的钱自己买轿车或乘坐出租车，住处附近又没有地铁站——地铁站附近的房价都比较贵，那么，你的地面的通行权，和20多年前相比，是反而缩小的。公共汽车一般不走高架道；大部分的地面道路，都将至少四分之三的路面划为汽车专用道，只留很窄的一条，给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走；许多新造的地面道路，都很宽，给步行者的绿灯时间往往极短，还不时有拐弯的汽车直冲到跟前；步行过马路，真是需

^①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空间结构，但在20世纪50—80年代，这个结构曾被一定程度地改变过：市中心区增设了大批小型工厂，和数量极多的简陋的自建住宅……

要不小的腿力和勇气。

我注意过几个亚洲城市,比如胡志明市、京都和孟买,在这方面似乎都比上海好一些,胡志明市的多数地面道路,都有大约一半,留给了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在我去过的一些欧洲城市,步行者所需要的腿力和勇气,似乎也比在上海所需的少许多。不过,如果城市交通的第一标准只是“速度”,没有如“公平”这样的标准从旁边制约它,上海的这种弱势者的地面通行权不断缩小的情况,恐怕会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普遍出现。

其三,广场基本消失了。上海曾经是一个革命和政治气氛浓厚的城市,这表现在城市的建筑空间上,就是有多处大型的广场和会场,以及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小型广场和会场。共产党和政府在其中组织各种会议和游行;有时候,公众也在这些地方举行各种集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在这样的時候,这座城市的公共政治,是有自己的建筑空间的。

但是,最近20多年,这些大大小小的广场和会场,大部分都被占用或拆除,变成了商业街、购物中心和其他各种商业设施;有一小部分保留了下来,但也被改造为剧院或展览馆,必须买票才能进入。与此同时,借助piazza这个意大利文的词,越来越多的新建的购物中心,给自己取名为“广场”。也许10年以后,大多数上海人会忘记“广场”这个词的政治含义,以为它就是一个商业消费的场所。

缺乏自信的执政者,总是害怕广场和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的,当规划和改造城市空间的时候,他们本能地就想缩小——甚至消灭——广场。但今天,在上海,地产和其他商业资本,又以另外的方式,更全面地消灭广场,以及其他一切空旷的、可能成为广场的露天和室内空间。这其实也就是在重新定义城市的居民:你们只是劳动力和消费者,你们需要的,只是公寓、餐馆、购物中心和电影院……

以我有限的经验,我很担心,这样的广场的消失,会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就算将大大小小的卡扎菲都赶下了台,也并不就能保住已有的广

场。必须展开更艰巨的斗争,用思想、艺术和法律,讲清楚一个基本的道理:土地和空间,绝不能被当作“资产”来对待。

上海并非只是让人沮丧。在弱势者的空间总体上不断缩小的同时,上海的市民也在创造低收入阶层可以享用的新空间。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新造了一个购物中心,它的大门外,是一片大约500平方米、铺着大块地砖的空地。大约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购物中心迟迟不开张,天气不冷的时候,附近的居民就会来占据这片空地。晚上七八点钟以后,许多人来这里跳舞、做操、乘凉、聊天,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低下收入阶层,还有不少是附近工地上的农民工。那些每天来跳舞的人,每人出几块钱,合在一起,请一个也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每天用自行车驮来一个磁带录音机和一对老式音箱,那音箱快散架了,靠两根绳子捆着,却依然发出巨大的声音,你从很远就能听到那些20世纪80年代的老歌,在黑黝黝的高楼间回荡。

类似这样的新空间,在今日的上海到处都能看到,其中许多都不稳定,可能半年三个月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但是,这一块消失了,别处又冒出新的一块,上海的弱势群体,不是一点都没有空间创造的能力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片空地也成了狗的乐园。大部分是附近居民家养的狗,有些人并不跳舞,也不做操,就是带自己的狗来会狗朋友,人起舞,狗撒欢,互相招呼,好不热闹。甚至引来了附近的几条无人喂养的野狗,先是远远地看着,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近,我不止一次看到,家养狗和野狗最终玩在了一起。平常时候,家养狗的主人多半要驱赶野狗的,但在这里,可能是人的自由进出的风气的影响吧,那些狗主人也松弛了许多。

在今天的城市里,最弱势的还不是人,也不是家养的猫狗,而是其他非家养的动物:树上的鸟、河里的鱼、街边灌木里的小动物……越是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城市里的非人类的活动空间就越缩小。今日上海,每天有多少猫狗鸡鼠,被碾成了路面上的一层皮?人类内部的倚强凌弱,和整体上人类对其他生物的倚强凌弱,一直都是互相促进的。所以,要了解一座城市里的弱

势者有多大的空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它的街上的非家养的猫狗,是不是一看见人就逃。

这些年,市民创造公共空间的努力,更多是用到了互联网上,由此开辟的网上的信息传播和言论空间,也就焕发出更多直接的公共意味。在这样的空间里发展起来的能量,有时候又会返回现实世界,和其他力量一起,创造出某种能强烈表达弱势者的意愿的现实空间、将街道等变为临时性的“广场”。2010年11月,成千上万的市民响应网上的号召,冲破警戒线,聚集到一幢因为地方政府失职而失火的大楼周围,表达强烈的不满,就是一个例子。

这样开辟出来的现实的抗争空间,当然不能持久,几天后就消失了。但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尤其是这几年,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广泛爆发,却提示了,这种主要是借助传播媒介建立起来的公共讨论和抗争空间,有可能成为今后城市公共空间中一个最活跃的部分。^①

今日中国,城市化已成最大的社会工程。但是,当城市空间急剧膨胀的时候,城市里的“弱势者的空间”又如何呢?是同步扩展吗?比其他的空间扩展得快?还是慢?如果答案竟然是“慢”,那么,我们有可能改变这个答案吗?比如说,能够通过重新分配优质的公共服务——医院、学校、地铁、税收等等——来消除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吗?能够不断扩大公众的自主创造力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压力,打破资本增值的逻辑和政府的政治短视,创造各种新的非都市(urban)的城市(city)模式?

有一点应该明确:“城市化是大势所趋”这样的判断,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想象城市未来的前提。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前提都不成立。如果城市化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只能对它小修小补,大的框架和结构不能改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明确地拒绝它,而去想象和创造别样的社会模式。

^① 这似乎也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弱势者的公共活动,正越来越多地被驱赶到互联网上去,实实在在的社会抗争,也就因此受到媒体的运作逻辑的深度影响。这种影响的负面作用,容当别论。

如今这样的正在世界各地疯狂膨胀、其实已经膨胀到头——例如在所谓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人类的长远生活无法接受的。我们不得不另寻他途。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代序 弱势者的空间——以上海为例	王晓明
------------------------	-----

一 当代上海的故事

邓伟志:赤子之心,星斗其文	002
印海蓉:闪过音像,留下岁月	011
颜文樑:一代油画艺术宗师	025
徐纯中:中国心,绘画缘	041
黄连萍:篆刻不灭,书法永存	059
俞卓伟:俯首甘为孺子牛	074
陈国良:中国造币机械专家的情怀	092
阳虹:从高端制造到高端创造	109
建筑的风雅颂	121
东方葵园畅想	126
商榻的原生态、田山歌及阿婆茶	132
蛇年	140

城市流变与精神迁徙	143
上海人	148
附录:海派中医的形成及其特征/严世芸	153

二 长江三角洲印象

巴城:蟹为天下第一鲜	166
知味震泽	171
故乡琐忆	178
梵宫的世界	183
让太湖重现碧浪美景	187
擦亮蒙垢的“太湖明珠”	192
为有清水源头来	196
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0

三 社会生态沉思录

“五饵术”	205
“治国”与“烹鲜”	210
为政的仁与容	213
精神缺钙	219
剖析“裸官”	223

“二奶”现象	227
造福子孙	231
走看西藏	235
关于自由	240
关于民主	244
关于幸福	248
男孩不会“打架”	253
读书与学书法	257
艺术的真实	261
健康三字经	265
论抑郁	269
人生的黄金年龄	273
后记	278

一 当代上海的故事



邓伟志：赤子之心，星斗其文

2013年12月上旬，在上海市政协咖啡室两次共达七八小时面对面地正式访问邓伟志，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尽管以前我们有过多次接触，也曾聆听过他的学术演讲包括即兴发言，留下语言犀利、话锋睿智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我常拜读他精彩、老到的杂文，如今零距离地对谈，则有更多受益。邓伟志从事学术研究50多年，始终严肃、勤奋、不懈怠，“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借得访谈，从中窥见他跌宕多姿、丰富多彩的学术人生。

“最难忘的三个学术领路人”

在上海市政协见到邓伟志，我发现几年不见，他的模样依旧，眼睛机警而沉着，神态从容而冷静，谈吐流利而恳挚，最具标志性的是他光秃而睿智的脑门儿。他非常平易近人，哪怕对咖啡室的服务人员，亲自搬椅子，还不时道谢。一俟坐定，立刻掏出笔、纸，记录我的问题以及他突发的灵感。开场白是从《邓伟志全集》开始，他说，全集中有些篇章写有“文中有许多严重错误的提法”，他补充说：“不收进这些错误文章就不像我邓伟志了，隐去了错误文章不仅不像什么‘家’，好像连做人的起码准则也没有了。”一席真挚、坦诚的话，使我感受到一个真正学者的情怀，不溢美，不遮丑，学者所写所言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

1960年邓伟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工作。说起这

段日子,邓伟志至今难忘: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如王亚南、周予同、周谷城、郭绍虞、冯契等,为他们讲课“开小灶”,院书记李培南着意要把他们培养成杂家、评论员,院长杨永直则说得更直白,杂家好比冲锋枪,“冲锋枪比重炮灵活,拷得动,拉得出。”所以,邓伟志他们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自觉把终身做杂家视为“民族的重托、国家的需要”。邓伟志回忆说,当时学习气氛浓,有领导、名师指导,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磨炼。邓伟志有许多师友,但最佩服、最敬重的有三位“高人”,第一位是刘瑞龙,他原是农业部副部长,20世纪60年代初,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农委主任。1961年,邓伟志一行跟随刘瑞龙去常熟白茆调研,有一次到白茆六大队第八生产队,进村前路过了八队的打谷场,刘瑞龙看了看稻草堆,说:“你们应该总结这个队。这位队长是位蛮不错的队长。”邓伟志愕然:你还没进村,也没见到队长,怎么能知道这位队长好呢?刘瑞龙可能看出邓伟志的狐疑,便解释:“你看这稻草堆,四周圈着草木灰。你们知道这草木灰做什么用的吗?是防止老鼠钻进稻草堆的。为什么要防止老鼠钻进稻草呢?因为他们脱粒时没脱干净。为什么不脱干净呢?是这队长想在稻草里藏点稻谷,等到青黄不接时,再脱粒当口粮,就不会饿死人了。这队长有预见,有水平。”邓伟志他们进村后实地调查,情况确如刘瑞龙所说。邓伟志感慨地说,刘瑞龙是农业部长,对农村情况如此了然于胸,真正做到心中有农!还有个“笑谈天下农书”的故事,有位研究农学史的一级教授学问大、脾气也大,不愿领受校领导布置的任务,声言“只听刘部长的”,校领导只得向刘瑞龙求救。与教授见面后,刘瑞龙只字不提任务,而是与他谈各种版本的《齐民要术》,又谈《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位教授大为惊讶,像是遇到了知音,刘瑞龙顺时拜托他指导几个年轻人编一份农学史资料,教授他愉快地领受任务告辞了。怪了,都说这位一级教授骄傲,怎么到了刘瑞龙面前就不骄傲了呢?一个实践经验超过生产队长的人,怎么在学术上又能同一级教授不相上下呢?贵相知,不相疑。做学问与做人同理。

第二位当属于光远。作为后学，邓伟志说道：“我在学术上无法同于老相比，可是，我在学术上同于老又有些相像之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受于老的影响太大了。”欲问“影响”何处？即“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勤奋好学，笔耕不辍”。邓伟志举出一例：于光远“嗜书如命”，为了借一本书读读，费尽心机。他读书破万卷，是标准的“采了百花再酿蜜”。在他身上读与写的比例是百比一、千比一。邓伟志说，从他的“读写比”始知什么叫理论深度和高度。深度不是自吹的，只有把头埋在书堆里，才能深；高度也不是捧出来的，只能是站在一位又一位学术高人的肩上，做到像杂技的“叠罗汉”那样，才能高。

至于第三位，邓伟志说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他的特点是“敢说真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年，邓伟志他们跟随曾希圣到奉贤县胡桥公社孙桥大队搞“四清”，曾希圣化名“余勉”，公开身份是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在孙桥，“余教授”和司机两人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超过20平方米的茅屋里。可是，白天在屋里找不到他；晚上，屋里又常常坐满了人。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喜欢往外跑。孙桥大队共有15个生产队，男女老少都认识“余教授”。按照上级吩咐，“余教授”出去要有人陪同、照顾。但“余教授”很喜欢甩掉陪同人员单独走出去，看饲养场、电灌站、自留地，找干部、社员谈话。当警卫员向他提意见时，他笑着回答：“到了孙桥，你们都是工作队员……”他单独跑生产队，可以说是“随机抽样”，他说：“不要以为住到了队里就是深入了。深入是过程，是学问。”说起来，邓伟志有过亲身经历：邓伟志有段时间兼任他的誊写员，一次曾希圣要他写阶级阶层状况的调查报告，邓伟志写了交曾希圣修改。曾希圣修改后，邓伟志再誊写清楚。正誊时，一位复旦大学的女队员来大队部送材料。她问邓伟志在干什么，邓伟志说誊写曾老的修改稿。她问：“曾老的文字水平怎么样？”邓伟志自不量力地给她吹开了：“这份报告中，‘曾中有邓，邓中有曾’，我已誊得差不多了。你能有本事看出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曾老加上去的吗？”她接过去辨别，不一会，她指着其中一句说：“这一句很深刻，你写不出。”邓